

【译 文】

主权的队列： 检验苏联背景下的分离理论¹

亨利·黑尔(Henry E. Hale)著 胡萍萍译²

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民族区域为了从多民族国家分离出去而激烈争斗，与此同时，另一些民族区域却为了留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而努力。文章运用了一个新的资料组来检验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解释，这个资料组包含 45 种情况，数量远多于以往任何在苏联环境下做的研究。得出的经验结果证实了一个论点：最易分离的区域是那些拥有最多财富，居住着最少被同化的民族群体以及已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我们发现，示范的效果也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能支持把群体向上流动性、技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著名理论。群体曾遭受过严重剥削的历史或民族独立经历也没有被发现能解释分离模式。

为什么一些民族区域为了从多民族国家脱离而激烈斗争，与此同时，另一些民族区域却为了留在同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而努力？这个问题分析了这个世界发生的那些翻天覆地的事件。实际上，正是一个个闹分离的共和国撕裂了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并使曾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呈现出杀气腾腾的骚乱景象。分离主义的危险并不是来源于历史场景中，然而有很多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加拿大和印度都包括了一些以少数民族界定的区域，这些区域至少会潜在地威胁到国家的统一。然而，几乎在每一个有着民族张力的国家中，我们总能发现存在民族性区域在寻求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情况。当立陶宛在 1990 年领先离开苏联时，与它相邻的白俄罗斯对于一体化的观念仍保有忠诚。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抓住机会离开南斯拉夫联邦时，黑山（南斯拉夫西南部的地方）还是继续跟着塞尔维亚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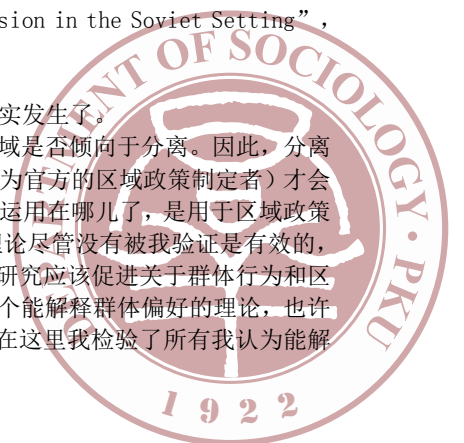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社会科学家已经发展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民族分裂主义³。一些理论指出区域历史的重要性，如民族受害经历可能导向独立倾向。另一些理论考核财富和发展的相对水平。还有些理论把分析重点放在了群体向上流动的前景空间中。最后，一些理论家观察着中心和边缘之间相互博弈的进程。如果这些理论中存在正确的观点，当考虑到前苏联⁴存在着这么多问题的情况时，这些理论的预测应该显示出清晰的模式。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主要理论至少有一个支持者明确宣称他或她的理论能够解释苏联众多民族区域分离倾向性的不同。因此，这篇文章是

¹ 本文英文题目为“The Parade of Sovereignties: Testing Theories of Secession in the Soviet Setting”，刊载在*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2000 (Vol. 30), 第31-56页。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³ 特别说明，我所感兴趣的是任何民族区域分离的可能性，而不在于分离是否确实发生了。

⁴ 为了避免误解，很有必要在开头说明这份研究的焦点是被官方界定的族群性区域是否倾向于分离。因此，分离社会运动只有在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时（包括他们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以及成为官方的区域政策制定者）才会进入研究视野。并不是我所检验的所有作者都清楚说明了他们的理论是把分离运用在哪儿了，是用于区域政策中，还是运用于群体偏好中，还是运用于分离社会运动的形成中。因此这些理论尽管没有被我验证是有效的，但可能在群体偏好或者社会运动中，这些理论仍然有一些解释力，并且，这份研究应该促进关于群体行为和区域行为之间之所以不同以及如何不同的理论发展。然而，一个人可以料到，一个能解释群体偏好的理论，也许也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群体的区域领导人会坚持这些政策。有鉴于此，在这里我检验了所有我认为能解释官方区域分离行为的主要分离理论。



对不同解释分离的理论的检验，以前苏联的新资料组为基础，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进行分析，这使我们有可能是先前的检验基础上有重大突破。文章会测试多达 58 个民族区域的案例，这比之前任何有关分离问题的回归分析的案例都要多，这将使我们获得更准确和更可靠的结果。

实际上，原来的许多观点是有问题的。首先，有些证据表明，最富有而不是最贫穷的民族区域是最想分离出去的。因为，如果别的群体控制了个国家，他们会被剥夺，失去的也就会最多。结果还表明，已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区域倾向于运用这种自治权力来要求更多的自治，也说明通过地方分权来平息不安定区域的方式，不太可能成功。这两个结果都令人吃惊，因为很多资料与此观点相反，很多研究认为，恰恰是处于最不利境况的族群和区域是最容易分离的。另外，研究表明，当本地族群与周围文化最不相容的情况下，这个区域是最有分离主义的。研究也证实了示范效应对于促进分离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重要区域的分离行为会鼓励其他区域效仿类似的行为。

令人吃惊的另一个发现是，在分析中，有些理论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也许最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区域的本土群体，无论是在过去遭受过中央政府残忍的族群迫害还是在 20 世纪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过，这些历史经历都与当前的分离运动无关。另外，没有发现证据支持群体向上流动理论的解释，而莱廷 (David Laitin) 所谓的“最受欢迎的领主”所在的区域似乎与其他区域一样想分离。最后，研究发现，区域内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与那些区域内没有高级技能的群体一样试图分离。

我对最重要的解释分离可能性的理论之间争论的总结作为文章的开端，进而说明苏联是一个出色的“天然实验室”来检验这些理论。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描述了利用数据所使用的先进统计技术（一个风险模型），然后讨论了研究的结果。

有关分离可能性的理论

当现存的相互比较的分离主义理论趋向于反映这个议题的复杂性时，最显著的一些理论归结为七个关键因素，我把它们列为区域财富、区域自治性、族群特殊性、群体技能、精英向上流动性、历史象征性资源以及示范效果。由于本文的重要工作在于验证这些理论，而不是仔细分析它们，因此我在这里只是简单重述这些理论的重要观点。

区域财富。赫克托 (Michael Hechter) 的分离主义理论是复杂的，但是他的一个关键论点是认为“一个国家中最贫穷、最不发达的民族区域最倾向于分离”。因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最依赖于联盟国家内区域间的贸易，这些区域会是最不可能分离的，因为如果经济联系²断裂了，它们会失去更多。我自己最近的理论工作，依照贝茨 (Robert Bates) 的逻辑，其结果表明事实与此观点相反：最富有而不是最贫穷的区域是最有分离主义³的。从 David Ricardo 到 Ernst Haas，

¹ David D.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44 (1991), 139-77.

²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The Dynamics of Secession", *Acta Sociologica*, 35 (1992), 267-83, p. 275.

³ Henry E. Hale, "Statehood at Stake: Democratization, Seces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Robert H. Bate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6 (1974), 457-84; Bates, "Modernization, Ethnic Competitio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Victor A. Olorunsola, eds., *State Versus Ethnic Claims: African Policy Dilemma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pp. 152-71. Other than these works, the "rich seceders" Hypothesis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theoretically, although several scholars have noted that rich Regions or ethnic groups seem to be the most secessionist. Immanuel Wallerstein makes a passing Assertion that this is true in his Africa: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88. Timothy M. Frye finds support for Wallerstein's claims in his focused comparison of ethnic groups in Spain,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although he does not develop Wallerstein's argument (which itself was not elaborated theoretically). Frye's study also does not use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ases he considers (see his "Ethnicity, Sovereignty and Transitions from Non-Democratic Ru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 (1992), 599-623). Milica Zarkovic Bookman notes that rich Regions often are, in fact, separatist but does not

理论家们告诉我们，在理论上，所有的区域都能在适宜条件下从联盟国家内部的自由贸易中获利，而所有的民族区域也面临着被剥削的可能性，倘若别的族群获得控制中央政府的巨大权力，这种恐惧在民主化¹的进程中得到增强。富裕区域在被剥夺的过程中失去的最多，然而，相反的是，贫穷区域只面临着被排除在技术转移之外的危险，也可能会减少获得高附加值商品并创造有着更高工资的工作以及得到发展补贴的机会。

区域自治性。有些作者，包括赫克托（Michael Hechter）和布拉斯（Paul Brass），认为已经享有高度自治的区域倾向于提出比较温和的分离主义主张，因为这些区域的精英已经得到有效的满足了。他们在两头都获益，既可以继续开发他们自己的相对自治，也能接近联盟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因此，他们有动机来保护这种权力，并防止更加激进的分离主义²要求。比较而言，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在讨价还价的背景下检验了本地自治性，他认为这些区域倾向于运用已有的制度资源来讨价还价，他们可通过提出分离要求从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因此，拥有更大权力的区域会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使这些要求更可信³。我最近的研究工作得到戈伦伯格（Gorenburg）的赞同，强调了制度资源在促进族群动员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围绕对自治的真正要求上，而不仅仅是特雷斯曼的讨价还价过程中⁴。

族群特殊性。大多数理论一致认为，如果一个区域的本土群体认为自己与国家的其他区域存在族群特征的不同⁵，它越有可能提出分离要求。然而，特雷斯曼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他主张分离主义者的行为与资源的讨价还价更有关，而不是族群性。⁶

群体技能。关于民族分离主义的最有名的理论是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的理论（Subrata Mitra 同意此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多族群国家里，由最“落后”⁷的族群团体控制的区域最倾向于分离。据说，在联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市场上，这些群体没有拥有竞争性的必须技能，因此，他们想通过分离来获得一种保护主义的优势⁸。罗格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却持有相反观点，

go so far as to claim that relative wealth is more Associated with separatism than relative poverty (see Book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Inter-regional Conflict*, New York: Praeger, 1991)

¹ Davi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Peiro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1817]); Ernst Haas, “Technocracy, Pluralism and the New Europe”, in Stephan R. Groubard, ed., *A New Europe?*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1963), pp.66-88; Haas, *Turbulent Fields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0 (1976), 173-212; and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²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p. 276; Paul R. Brass,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in Alexander J.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of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99-128

³ Daniel S.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 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41(1997), 21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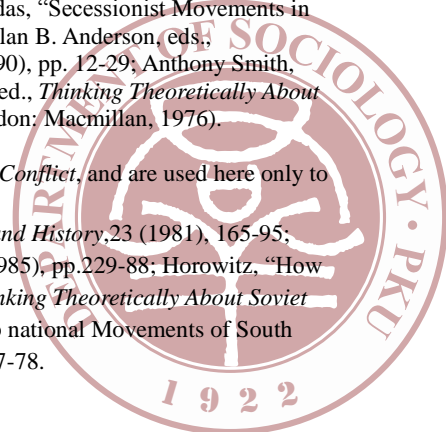
⁴ Dmitry Gorenburg, “Nationalism for the Masses: Minority Eth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ussia Feder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expected 1999).

⁵ Hudson Meadwell, “Breaking the Mould? Quebec Independence and Secession in the Developed West”, in Sukumar Periwal, ed. *Notions of Nationalism*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29-C61; Meadwell, “Nationalism in Quebec”, *World Politics*, 45 (1993), 203-41; Meadwell and Pierre Marti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 (1996), 1-21; Ralph Premdas,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alph R. Premdas,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Alan B. Anderson, eds.,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 12-29; Anthony Smith, “Ethnic Identity and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pp.45-65; and Anthony Smith, ed. *Nationalist Move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6).

⁶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p. 243.

⁷ The terms, “advanced” and “backward” groups are from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and are used here only to represent his theory clearly. No normative connotations are intended.

⁸ Donald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 165-95;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29-88; Horowitz, “How to Begin Thinking Comparatively About Soviet Ethnic Problems”, in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Subrata K. Mitra, “The Rational Poli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Sub national Movements of South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95), 57-78.



他认为理性的族群团体不会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国家，除非他们具有使国家成功运转的必须技能。因此，从这个逻辑出发，最先进的群体所控制的区域是分离主义倾向最强的。¹

精英的向上流动性。很多理论家认为，在政治中心，如果族群被集体否定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族群越有可能分离。歧视程度越高，分离的倾向性越大。²相反地，莱廷（Laitin）认为一个控制了最上层流动的群体的区域领导者（他的“最受欢迎领主”）倾向于在政治自由化后立即采取分离立场。³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与本地更年轻一代的精英有效竞争。这些年轻一代的精英试图通过提出分离的主张来超过老一代，由此削弱老一代的基础。

历史象征性资源。这一类资源包括两个假设，两个假设都宣称一些区域可以基于一些特殊历史经历的象征资源来提出分离要求。首先，格尔（Ted Robert Gurr）及其他人认为，曾有过民族独立的现代历史的族群最有可能将分离作为解决群体问题的手段。⁴其次，经常会这样假定，如果一个区域的本地群体曾在联盟国家的控制下遭受过巨大不公正待遇，这个区域越有可能分离，这些罪行可能包括大规模驱逐或者大范围的种族清洗。

示范效应。格尔（Gurr）注意到在动员族群怨恨中有着示范效应的传播。⁵这仅仅意味着，一个区域更有可能尝试分离，如果它的周边区域已经分离了或者在分离道路上先行采取了重要措施。这些先行者不仅减少了感知到的危险，也提供了鼓舞人心的实例，使未来这样的行动更有可能。

一个适于理论检验的极佳的天然实验室

虽然一个理想的理论检验应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案例，但是，它所要求的收集数据的巨大任务只能留给未来的研究。然而，分析苏联的案例是检验这些理论的一个出色策略，在一些重要方面，它甚至使我们避免了一些跨国比较的困难。在苏联终结的1991年，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包括了53个族群定义的行政区域。在这些区域中，一些区域实际上提出了分离的要求，同时，另一些区域没有提出分离要求，苏联政府收集了很多关于这些区域和它们的要求的信息。因此，用于检验我们感兴趣的理论的工具是现成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获得重要、精确的分析结果，这篇文章拥有的案例的数量和信息的丰富度远远足够。

实际上，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研究这么多的族群区域，使我们的结论更强大、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可信了，这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超过了跨国研究。

本文将重点放在世界上单独一个区域的做法遭到反对，因为没有考虑到不同于这个区域的来自于其他区域的相关因素，这样的研究结果只能运用于这一个区域。这应该被读者谨记，这些关于民族分离主义的情境变量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实际上理论没有得到发展。既然我们没有基于控制“隐藏”的情境变量的理论，那么，在没有控制情境变量的条件下去验证我们感兴趣的现存理论是危险的。除非理论发展了，能够指导我们去避免变量误差遗漏。

更重要的是，需要指出的，实际上，我所验证的所有现存理论都声称具有普遍性质，在运用上没有地域限制。如果我上面列出的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它们在解释苏联的民族区域方面也应该有效的。理论家本身最支持这一观点，他们中的很多人明确运用了他们的理论来解释苏联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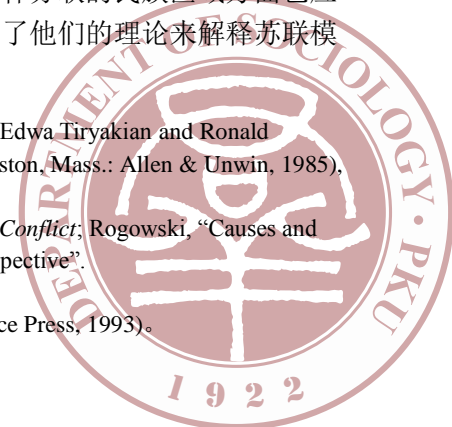
¹ Ronald Rogowski, "Causes and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 Rationalist Account!" In Edwa Tiryakian and Ronald Rogowski, eds., *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 Toward Explanation* (Boston, Mass.: Allen & Unwin, 1985), pp.87, C108.

² Mitra, "The Rational Poli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Rogowski, "Causes and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nd Premdas, "Secessionist Movemen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³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p. 15.

⁴ Ted Robert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⁵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式。¹他们是否说明了他们的理论能被运用或者不能被运用的条件，其中的责任在于理论家自己。由于吸引我们的理论家没有向我们提供限制性条件，我们自己也可能忽视了这些条件是否以及如何起作用，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个研究已经而且有效地控制了可能的情境变量，这些变量很少被知，并且这些变量在跨国研究中会歪曲结论。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限制，这会让我们结论尽可能的可信。这并不是说不应做跨国研究，而是说，在现有的理论发展阶段，重点放在苏联，会在跨国研究中占有重要的方法优势。实际上，通过在苏联的环境下验证理论，现有的研究有望加速发现并总结任何有关情境变量的过程，这些情境变量有可能影响重要的可比较理论的应用性。

在这个研究中，我使用了 45 个苏联划定的民族行政区域以及名义上的族群。我从苏联 53 个案例总量中只排除了 8 个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我去除了爱沙尼亚，考虑到接下来会讨论的示范效果，我使用了它作为起点（基线），衡量其他区域的分离主义。其次，我排除了阿扎尔自治共和国（Ajar）和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Nakhichevan Autonomous Republics）²以及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因为根据苏联全国普查的标准，它们不是被民族划定的。第三，我删去了另外三个案例，因为在恰当的年份，找不到对关键经济变量的测量。它们是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以及纳卡。最后，我略去了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因为我没有获得对它的分离主义程度的正确测量。总的来说，剩下的 45 个案例的代表性远远高于其他关于苏联分离主义的统计研究，在理论验证的准确性和可信性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³

分裂倾向的量化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晚期，在寻求自治性方面，涉及到诸多的苏联民族区域，从激情的民族主义洋溢的波罗的海国家到平静的联盟主义的哈卡斯（Khakassia）。如果观察者能清楚看出多样的模式，这个统计研究把分离主义作为可测量、可计算的单元就越容易。在埃米泽特（Kisangani Emizet）和赫斯利（Vicki Hesli）的开创性文章中，他们提出要观察每一个苏联共和国宣称主权的时间。⁴假设是：越急切的分离主义者会越早宣称主权。这很有道理，因为在苏联的个案中，一般是民族主义者为了抓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自由化所提供的时机会，推动立即宣称主权，有时甚至从联盟中退出。重要的是，一个共和国宣称主权，并不必然表示它首选分离，也可能宣称它将以自己的方式留在联盟里，然而对于那些想要完全分离的区域，这通常是在通往独立的路途中采取的第一步。因此，最热心的分裂分子倾向于最早宣称主权，

当加盟共和国确信宣称主权只是意味着在重建联盟的协商中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就会有更多的加盟共和国这样做。因为，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和自治区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宣称主权，因此，它们做这样事的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运用于每一个案例的测量方法。既然这涉及时间

¹ Hale, "State hood at Stake"; Horowitz, "How to Begin Thinking Comparatively about Ethnic Problems";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Brass,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and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² 分别属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译者注）。

³ 在这里，按次序对另两篇此领域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比较。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Kisangani N. Emizet 和 Vicki L.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7 (1995), 492-536) 只考虑了 15 个在苏联统治集团中最高级别的加盟共和国。包含前苏联其他民族区域，不仅给了我们更多的信息，而且也能使更精确的判断成为可能。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将他研究的案例范围限制在了俄罗斯联邦内部，因为他对于苏联解体后这些区域的行为更感兴趣。聚焦于后解体（post-collapse）行为，他被迫排除了不以俄罗斯联邦作为优先选择的区域案例。为了验证我们所感兴趣的相互比较的分离主义理论数据，需要苏联时期充足的数据，however, lessening the impact of this sacrifice for our purposes. 另外，聚焦于更少的案例，Treisman 失去了一些信息，也牺牲了结论的准确性。尤其是，他失去一些自变量的变化，如财富，通过排除最富有的苏联区域如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最贫穷的中亚区域。这很重要，因为，在相类似的共和国之间，整体或特定变量上将会因为个案太少而难以归结出变异性。因此，包括前苏联的案例，现有的分析代表了对先前研究的重要进步，尽管它包括一些对 Treisman 方法的借鉴。

⁴ Emizet and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timing), 这种测量方法也使我们能验证示范效果, 一个区域宣称主权会鼓励其他区域效仿。很多观察者, 例如, 格尔 (Gurr) 已经注意到这些效果 (上面已经讨论过) 的重要性, 通过将它们考虑在内, 这种测量分离主义的方法优于很多统计方法。¹

当然, 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例如, 一个人可以想象, 在一个案例中, 两个支持独立的派别主导了一个共和国的领导权, 但是两个派别在独立形式上分歧很大。这样的话, 在主权宣称内容上的争斗会延迟宣称本身。因此, 时间, 也许反映了程序性限制或者与独立程度无关的次要议题。然而, 这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这些条件可以视为毋庸置疑的大量随机事件, 它们使得所有的统计研究具有不确定性。² 我们的研究看起来只是为了广泛的倾向性, 宣称主权的时期模式仍然应该能反映出这样的倾向性。第二, 当分离主义情绪强烈时, 次要议题或程序议题的延迟不应是经常发生的。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围绕最初的主权宣称, 然而, 随后他们会陷入经常性的争斗中, 因为他们不得不决定主权的形式。另外, 主权宣称的一般模式确实与观察者对于分离主义倾向最强的共和国的一般印象相一致: 波罗的海国家率先, 联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宣称主权明显较晚。³

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采取了“主权宣称”。在一些案例中, 采取的是法律上的主权 (laws on sovereignty) 或者一系列法律在主权宣称之前被采纳。主权宣称的要素在于声称一个区域的法律在本地优先于联盟法律, 并且这种权力只能被自愿的放弃。记住这一点, 我跟随着 Emizet 和 Hesli, 将正式声称主权作为第一步的官方行动。这儿, 我没有把区域从自治区域上升到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上升计算在内, 除非这些行动能被称为主权宣称。⁴

我测量了主权宣称的时间, 把第一个宣称主权的区域 (爱沙尼亚) 定为零点, 原因在下面说明。⁵ 因此, 我的因变量是一个特定区域宣称主权晚于爱沙尼亚几周。我的观察期结束于苏联 1991 年 8 月政变后的第 144 周, 那时只有六个族群区域还没有声称主权。⁶ 这份研究把这六个在第 144 周没有宣称主权的区域考虑进去了。⁷

因为我使用“主权检阅”作为一个指标, 我在回归中包括了一个变量 (1989 年人均消费品生产) 来控制被巴尔利 (Donna Bahry) 定义为对这些事件的独特影响。⁸ 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当地领导在本地为消费品生产负责, 同时否认他们有效管理的权力, 因而促使享有最多消费品生产份额的共和国最早宣称主权。

统计方法

选择一个合适的统计模型

大多数统计研究都假设因果关系是线性的, 偏离一般会围绕着这条线。我的因变量是, 如

¹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² 假设它们与自变量、因变量不是系统一致的, 否则偏见会产生。

³ 初看, 车臣似乎是个例外, 但是这主要指出了这份研究没有考虑共和国政治变化的事实。实际上, 在我们所感兴趣的这段时期, 车臣确实在追求一种相对联盟主义。苏联在 1991 年 8 月的失败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 紧跟此事件, 苏联将军杜达耶夫 (Djokhar Dudaev) 在车臣夺权并迅速动员大众支持激进的分离主义政策, 当时的特殊环境也促进了事件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 即使一个人认为宣称主权的时间会错误的测量车臣这个案例, 这并不会大幅度的改变研究结论。当我把车臣作为与立陶宛 (仅次于爱沙尼亚的最想分离的区域) 分离程度相同的区域, 统计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

⁴ 然而, 这些案例的编码与我们的结果无关。在这四个案例中, 如果我把“地位上升”作为主权宣称, 关于财富和分离主义之间相关的置信度会下降到 93% 水平, 略低于我们通常所用的 95% 统计信度。同化变量也类似的下降到 91% 的信度水平。涉及到的 4 个案例是布里亚特自治区, 犹太自治州, 哈卡斯和莫尔多维亚 (Mordvinia)。

⁵ 然而, 我的确运行了一个包括爱沙尼亚案例的回归, 使用了 1988 年夏天第 19 次党会作为苏联自由化的起点, 计算一个特定共和国在这个事件过去几周后才宣称主权, 即我的因变量。在结果上没有大的变化。

⁶ 它们是布里亚特自治区, 犹太自治州, 哈卡斯和莫尔多维亚 (Mordvinia)。

⁷ 也就是说, 这些值被认为是删节的。

⁸ Donna Bahry, “The Union Republics and Contradictions in Gorbachev’s Economic Reform”, *Soviet Economy*, 7 (1991), 215-55.



上面所说，爱沙尼亚宣称主权之后，一个特定区域宣称主权所花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持续时间（duration）。这意味着我们感兴趣的因果关系不能被适当的模拟为线性的。如 Gary King 和其他人认为的，当研究持续时间时，使用线性方法（最小二乘法，OLS）会引起严重的问题，由于定义，持续时间由零值开始，因此取值总是正的。¹一个线性关系可以预测出负值，而这对于持续时间没有任何意义。考虑到极值，线性模型很有可能（尽管可能性不大）在它还没有产生之前，预测出一个区域将要宣称主权。这暗示，在持续时间中运用线性模型不是有效地，因为它没有利用所有可能的信息，没有考虑到潜在的干扰因素和正确的函数形式。²

为了强调这个问题，在 Emizet 和 Hesli 分析介绍中，我使用了一个“持续时间模型”。³这是一个专门的统计技术，研究一个事件如主权宣称的发生所需要的时间。它也被称为“风险模型”，这些方法在政治科学中日益受欢迎。⁴尽管有各种持续时间模型，我使用了一个 Weibull 分布。既然这个理论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我在这儿只简单说明。⁵

考虑到这个理论已经发展得很好，Weibull 模型最强大的地方，也是与其他持续时间模型相反的地方，就是时间依赖参数的预估。也就是说，这个模型使我们能够评估，在苏联晚期，在何种程度上，随着时间推移，时间是如何使主权宣称更有可能的。在下面的结论讨论中，时间依赖参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会更清楚。下面的等式中，时间依赖参数可表示为 p 。当 $p < 1$ ，存在负的时间依赖，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事件（如一个主权宣称）越不可能发生。当 $p > 1$ ，时间依赖是正的，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事件越可能发生（也就是说，预计持续时间缩短）。⁶

时间持续模型一般被表述为三种方式：作为一个风险函数（ $\lambda(t)$ ：一个事件在某个时间点 t 发生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生存函数（ $F(t)$ ：在一个特定时点之前事件不会发生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概率密度函数（ $f(t)$ ：事件发生的时间分布，有时被可怕的称为死亡密度函数）。⁷我们按照 Greene、Kalbfleisch 和 Prentice⁸ 那样假设，自变量 x_i 与期望持续时间 λ 通过指数 β 相关：

$$\lambda_i = e^{-\beta x_i}$$

¹ Gary King, "Statistical Models for Political Science Event Counts: Bias in Convention procedures and Evidence for the Exponential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1988), 838-63, p.851; Gary King, James E. Alt, Nancy Elizabeth Burns and Michael Laver, "Model of Cabinet Dissolu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1990), 846-71, pp.845.

² King, "Statistical Models for Political Science Event Counts", p.84.

³ Emizet and Hesli,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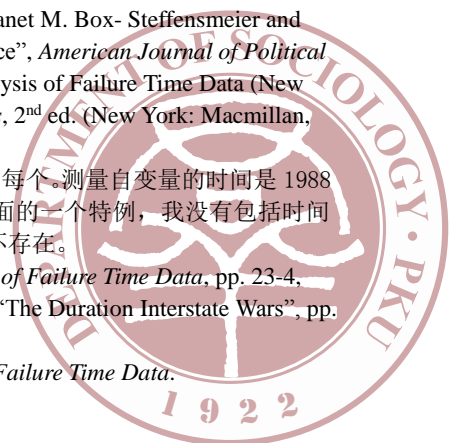
⁴ One of the most recent and methodologically rigorous studies is D. 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 Stam III, "The Duration of Interstate Wars, 1816-198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1996), 239-57. Other political science applications include Joel S. Helman, "Competitive Advantage: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Post communist Tran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1996), and several studies of how long leaders or governments remain in power: King et al., "Model of Cabinet Dissolu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Henry Bienen and Nicholas van de Walle, "A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of Leadership Du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54 (1992), 685-717; and Paul Warwick, "Economic Trends and Governmental Survival in West Europe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992), 875-887.

⁵ For a discussion of duration models, see articles in the previous footnote as well as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and Bradford S. Jone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Event History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997), 1414-61; J. D. Kalbfleisch and R. L. Prenti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New York: Wiley, 1980), pp. 23-4, 30-54-5; and William H.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717-718, 721-722.

⁶ 这篇文章使用的数据组包括一个持续时间，相应于所研究的 45 个民族区域中的每个。测量自变量的时间是 1988 年，这时测量的持续时间都开始，或者是对此点尽可能靠近的年份。除了下面的一个特例，我没有包括时间持续研究中有可能已发生的自变量值的变化，这些变化一般被认为不重要或不存在。

⁷ This paragraph draws primarily on Kalbfleisch and Prenti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pp. 23-4, 30-2, 54-5;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pp. 717-18, 721-722; and Benne and Stam, "The Duration Interstate Wars", pp. 244.

⁸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Kalbfleisch and Prenti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ilure Time Data*.



不巧的是，这个函数作为持续时间模型好的方面是，它总是正的。Weibull 条件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lambda(t; x_i) = \lambda(p)(\lambda t)^{(p-1)}e^{-\beta^p x_i}$$

Weibull 条件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f(t; x_i) = \lambda(p)(\lambda t)^{(p-1)}e^{-\beta^p x_i} \exp[-(\lambda t)^p e^{-\beta^p x_i}]$$

Weibull 条件概率密度函数是“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特例，自变量 χ 在因变量上的乘法效应取决于风险函数的一个“起点” $\lambda_0(t)$ ， λ_0 被定义为

$$\lambda_0(t) = \lambda(p)(\lambda t)^{(p-1)}$$

当风险起点是随机的、不确定的，在这个案例中，它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当区域被剥夺了所有的识别特征后会宣称主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我们感兴趣的时期内，有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是风险），任何民族区域都有可能因为一些随机原因（例如领导者的突发奇想）而宣称主权，尽管我们感兴趣的自变量 χ 使主权宣称或多或少的像上面的函数所描述的那样。

拟合值可以这样表示：¹

$$e^{-\beta^p x_i} \Gamma(1/p + 1)$$

如何最好的解释 Weibull 结果

Weibull 结果允许我们很容易的进行判断，例如，是否越富有，主权宣称得越快。这个模型给每一个自变量产生了一个系数。如果这个系数是正值，我们知道，在宣称主权前，自变量值的增大与更长的时间相联系（也就是说，它们与更低水平的分离主义相联系）。与标准 OLS 回归一样，我们可以轻松地计算出这种关系发生的可能性不是随机的。

这只是说财富是有影响的，然而，却没能告诉我们这种影响有多大。不幸的是，这种影响规模不能由 Weibull 模型直接得出。这是因为，如之前所说的，影响一个区域何时宣称主权的因素 x_i 不是线性的。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数据中看到影响因素 x_i 的效果有多大。实际上，如上面公式所表示的，两个变量之间是指数关系，并且被时间依赖参数所修正。一个自变量的影响可以因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因另一个自变量值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测量一个特定因素效果的最好方法是，进行一系列社会实验。当我们最初在统计分析中加工所有信息时，这个分析不仅告诉了我们，是否不同的解释因素与宣称主权时间相关，而且还在给定的信息基础上，产生了一个能很好预测主权宣称时间的模型。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信息，模型会在新信息的基础上产生一系列新的预测。这允许我们进行很多反事实的练习。例如，为了检验财富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把最富有的民族区域变为最穷的民族区域，同时保持其他的因素不变。由此导致，模型所预测的区域宣称主权所需时间长度会产生变化，这使我们更清楚的理解财富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的效果有多大。在一个真实区域里，以系统的方式使重要变量的值发生变化，²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些影响因素的真正效果是怎样的。

结果

结果强有力的支持了所检验的一些理论，同时，另一些理论在理论解释力上有局限性。

表格 1 统计分析的主要结果说明：因变量是一个苏联的民族区域宣称主权所需要的时间，

¹ 这个表达式不同于一些其他文章，例如 Greene, *Economic Analysis*；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它是正确的，甚至是 Greene 自己（详见 Benett 和 Stam, “The Duration of Interstate Wars”）。

² 这篇文章提高或降低了一些特定变量的值，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区域以一系列不同的自变量值为起点。



也就是在爱沙尼亚 1988 年 11 月宣称主权之后还用了多少周的时间。系数的负号意味着随着变量值的增加，一个区域宣称主权所需花费的时间减少了，我解释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增强（N=45）。

2005 年本地大学学生注册

因子测试	系数	解释
区域财富	- 0.430084**	增强了分离
区域自治性		
AO	0.4875974**	增强了分离
ASSR	0.2528836*	
族群特殊性	- 0.006855*	不显著
群体受教育水平	- 0.0016567	不显著
精英集团流动性	- 0.0172058	不显著
独立历史	- 0.2320993	不显著
曾被苏联当权严重迫害	- 0.0799936	不显著
示范效应：俄罗斯宣称主权	- 0.445922*	增强了分离
时间依赖水平下的示范效应	$p = 4.478406$	随着时间流逝，主权宣称越有可能
生活消费品的生产	- 0.2086687*	增强了分离
常数	6.058973	——

* 通过 95% 统计显著性检验。 ** 通过 99% 显著性检验

从表格 1 和表格 2 可以看出，最分离的民族区域可能是经济最富有，居住着最少被同化的民族群体，已经拥有最多自治权的区域。并且，结果证明，强示范效应在起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分析没有支持这个观点：分离的倾向取决于政治中心中（最受欢迎的领主地位）族群向上流动性。结果也质疑了这个看法：族群会基于他们掌握的技能而理性计算是否分离。出人意料的，这个统计分析还总结出：有过民族独立的历史经历以及在中央政权下受过残忍的迫害的历史经历并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些共和国比其他共和国更分离。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会讨论，对应于我所验证的每一个理论，统计结果表明了什么，然后再回到结论部分更广阔图景中。

区域财富

统计分析显示，高财富水平与强分离主义之间高度相关，结果与我之前的观点相一致，与贫穷的区域相比，如果富有区域继续留在一个联盟国家内，它会有更多的恐惧，得到的更少。在苏联晚期的特殊情境下，为了量化财富，我使用了 1988 年测量的人均零售商品营业额。¹ 在一个详尽的统计研究中，德米特耶娃（Dmitrieva）认为，其他国家通常用来代表财富的指标被苏联指令性经济的情境严重扭曲了。² 她挑选出零售商品营业额作为测量生活标准最准确、最敏感的指标，因为它反映了生产水平和消费者对物品的需求。³ 看这些结果，我们可以自信的，这个财富指标与宣称主权的时间是相关的。这个结果不是随机的可能性小于 4%，远远超过了统计通常要求的 95% 的置信水平。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表格 1 中看出，系数的符号是负的，这

¹ 我没有使用 Emizet 和 Hesli' s ('The Disposition to Secede') 测量自变量的方法是因为以下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测量方法只能用来测量十五个联盟共和国，而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其他三十个案例。第二，他们分类背后的逻辑以及选择的指标并不清晰，而且与我感兴趣验证的理论不是直接相关的。第三，他们没有在研究中明确区分出民族群体和共和国。例如，他们将社会发展作为测量一个群体先进或落后的指标，涉及到整个共和国人口（不仅是民族群体）居住在城市区域的比重。最后，他们有时在同一个指标中混合变量和变量的变化速率，然而它们不一定同时变化，也许也反映着不同的东西。我也尽力避免了他们使用的很多指标，因为他们使解释大大复杂化了。我使用了很多与 Treisman 同样的测量方法（'Russia's "Ethnic Revival"'），尽管他的一些测量方法不适用于我感兴趣的时间段里的苏联一些区域。

² Oksana Genrikhovna Dmitrieva, Regional' naya Ekonomicheskaya Diagnostika (Saint Petersburg: Izdatel' stvo Sankt-Peterburgskogo Universiteta Ekonomiki I Finansov, 1992), pp.130-2.

³ 她也使用了医生数和人均病床数作为社会发展（她将此等同于生活标准）的合理指标，尽管认为这些不是敏感指标。她所写的与社会发展一些指标相关的、从理论上得到证明的另一些指标（如婴儿死亡率）并没有在本研究中得到使用。See Dmitrieva, Regional' naya Ekonomicheskaya Diagnostik, pp.116-17.

意味着富有区域倾向于最早宣称主权，支持了黑尔（Hale）而没有支持赫克托（Hechter）。我们把零售商品销售额替换为别的测量区域财富的指标（人均服务量，人均医生数），这些结果仍然存在，尽管不是所有这样的指标（城市化，人均医院数）都被证明是与宣称主权的时间高度相关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上面所认为的，最能反映理论逻辑的变量（零售商品营业额）实际上是和宣称主权的时间高度相关的。总的来说，结果支持这个假设：贫困往往会限制族群区域从多民族国家分离。¹

表格 2 所检验变量的独立影响：一些模拟社会实验²

(a) 相对财富	拉脱维亚的水平 (1.86)	白俄罗斯的水平 (1.41)	塔吉克斯坦的水平 (0.68)	最大值-最小值的变化%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财富水平：				
拉脱维亚（富有）	38 个星期	46	63	66
白俄罗斯（代表性）	46	56	77	55
塔吉克斯坦（贫穷）	51	61	84	40
<hr/>				
(b) 区域自治性	对于 SSR	对于 ASSR	对于 AO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等级：				
拉脱维亚（SSR）	38 个星期	49	62	63
塔吉克斯坦（SSR）	84	108	136	62
鞑靼（ASSR）	68	88	111	49
Ust-Orda 布里亚特（AO）	77	99	125	38
楚克奇（AO）	62	80	101	39
<hr/>				
(c) 族群特殊性	格鲁吉亚的水平 (98.2)	白俄罗斯的水平 (70.9)	Evenkia 的水平 (30.4)	
如果我们调整它们的水平：				
格鲁吉亚（高）	59 个星期	71	94	59
白俄罗斯（低）	47	56	74	48
埃文基 Evenkia（非常低）	89	107	141	37
<hr/>				
(d) 群体技能	格鲁吉亚的水平 (17)	塔吉克斯坦的水平 (7)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水平：				
格鲁吉亚（高）	59.1 个星期	60.1		2
塔吉克斯坦（低）	82.7	84		2
<hr/>				
(e) 精英向上流动性（MFL）	格鲁吉亚的水平 (1.24)	塔吉克斯坦的水平 (0.32)		
如果我们改变它们的水平：				
格鲁吉亚（高）	59.1 个星期	60		2
塔吉克斯坦（低）	82.7	84		2
<hr/>				
(f) 曾独立过的历史	有过独立	没有独立过		
拉脱维亚	38 个星期	48		26
乌兹别克斯坦	65	81		20
<hr/>				
(g) 受害的历史	受过迫害	没有受过迫害		
拉脱维亚	38 个星期	41		8
乌兹别克斯坦	75	81		7

说明：使用统计分析生成的模型，这个表格表明了重要解释因素的影响。例如，(a) 部分记录了相对财富方面的影响力变化。在第一排，我们理解了如果把拉脱维亚变贫穷后会发生什么。最初，我们预测拉脱维亚会在时间零点（爱沙尼亚宣称主权的日期）后的第 38 个星期时宣称主权。如果我们把它的财富水平降低到像白俄罗斯（它是 1.41）一样，我们预测拉脱维亚会在 46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如果我们把它直接降到塔吉克斯坦的财富水平上（0.68），爱沙尼亚会在 63 周后宣称主权。最后一列是表明实验后，拉脱维亚宣称主权所用时间产生的总体变化是 66%。

¹ 这为 Treisman's ("Russia's 'Ethnic Revival'") 怀疑二者关系重要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统计支持，即使他自己的统计研究没有包括足够多的案例来产生统计显著的结果。Treisman 对财富和区域分离主义行为之间关系的解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富有区域直接参与世界市场，因此能对分离产生更可信的威胁，所以，富有区域能向中央索要更多的资源。

² The substantive significance of Tested Variables.



财富不仅会使一个区域更分离，并且它会使该区域的分离程度比以前提高很多。在表格 2 中，我叙述了研究对于财富效果的估计，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像上文统计方法部分描述的那样，将这个表格放在一起，在定量世界，我展示了一系列模拟社会实验。首先，我做了 Stalin 也许曾经想做的，从苏联两个最富裕的区域挑出一个区域，拉脱维亚，使它完全贫困，降低到塔吉克斯坦的贫困水平。根据我们的模型，“贫穷的拉脱维亚”在 63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与“富裕的拉脱维亚”在 38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的情况相反，晚了 66%。然后我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使塔吉克斯坦达到与拉脱维亚同样的富裕水平，与贫穷的拉脱维亚用了 84 个星期宣称主权不同，“富裕的拉脱维亚”只用了 51 个星期。这样的变化使塔吉克斯坦从“晚期分离者”的队伍进入到急切分离者的范围。这些以及其他模型的检验证明了，财富确实对分离主义有重要的决定作用。¹

自治性

一个区域已有的自治程度与提出分离主义的宣称之间高度相关。在苏联，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等级的民族政治单元，每一个等级都反映了一个不同的自治水平和一系列不同的制度资源。“加盟共和国 (SSRs)”等级最高，仅低于苏联中央政府，拥有最全的机构，包括大学和科学研究院。当苏联在 1991 年垮台时，是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国家。低一点的等级是“自治共和国 (ASSRs)”，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等级最低的是“自治区和自治地区 (AOs)”。它们通常（尽管不总是）附属于一个加盟共和国。由于不知道行政层级下的两个等级是否对分离主义有同样大的影响，因此，我采用了两个虚拟变量，相应于每一个层级的下降，以便能检验出自治性的影响，并分别估计它们的参数。

如特雷斯曼 (Treisman) 的讨价还价假设所预测的那样，最高等级的区域会做出最具有分离主义的宣称。不同于布拉斯 (Brass) 和赫克托 (Hechter) 所预测的，这些区域不仅不会被更多的自治、制度资源抚慰，反而会使用这种权力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力和制度资源。特雷斯曼认为这有道理，因为，最有权的区域最有能力使分离要求可信，迫使中央领导用补贴或其他资源来安抚它们。实际上，我的这份研究而不是特雷斯曼自己的统计工作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因为现在的分析包括了三种水平的自治（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而特雷斯曼自己的研究只包括了后两个。然而，这些结果与戈伦伯格 (Gorenburg) 的制度主义观点是一致的，他没有考虑讨价还价行为的重要性。根据他的解释，最高等级的共和国是最反叛的，不单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紧跟来自莫斯科的资源，而且拥有很多资源来追求这些目标，并且由于这些共和国有着一系列强大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培养族群认同，有利于在苏联时代动员民族主义情绪。

如表格 2 所呈现的，这种力量的效果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将拉脱维亚从加盟共和国下降到自治区，我们的模型会显示出，拉脱维亚自治区在 62 个星期后宣称主权而不是原先预测的 38 个星期，晚了 63%。同样的，如果我们将偏远的西伯利亚的楚克齐 (Chukchi) 自治区提升为楚克齐加盟共和国，它只用了 62 个星期宣称主权，不像最初预测的 101 周。因此，这样的变化使主权宣称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多。

族群特殊性。

族群特殊性似乎是苏联分离主义的基础。因为，语言一般被认为是族群特殊性的一个核心

¹ 我的统计软件 Stata 不允许我从时间变化的协变量 (TVC) 数据中得到预测（看接下来在“示范效果”中的讨论，会明白为什么这个脚注在这这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只对每个自变量的影响有多大感兴趣，而不是对能进行最准确预测的模型感兴趣，我是这样编码的，对于非 TVC 模型能预测出的会在俄罗斯之前宣称主权的所有共和国而言，把俄罗斯是否已经宣称主权的变量编码为 0，剩下的编码为 1。因此，对于早于俄罗斯宣称主权的共和国，在拟合值上没有失真（拉脱维亚、立陶宛）。对于那些晚于俄罗斯宣称主权的共和国，所预测的宣称主权所需的时间要低于一个 TVC 模型能预测的，因为这些区域被假定从一开始就是受俄罗斯示范影响的。在所有案例中，我们对于待检验因素的相对影响的预测都不应受到威胁。



要素（当然，有一些明显的特例），我把 1989 年苏联全国普查中宣称族群语言是本地语言的族群比例作为测量同化程度的标准。根据统计结果，一个区域的本土群体越少被同化到周围文化中，该区域越想分离。这个相关关系有超过 95% 的可能性不是随机的。这与特雷斯曼的发现相矛盾，他以更少的案例说明这些因素与分离主义行为是无关的。

现在的研究不仅证明族群特殊性是重要的，而且也显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为了证明这些影响的显著，我再次使用了 Stalinist 社会实验假设。首先，我选择了格鲁吉亚，超过 98% 的人口宣称格鲁吉亚语是它的本土语言，除了族群人口的 30%，我把它全部同化。被同化的格鲁吉亚现在与埃文基（Evenk）自治区域的同化程度一样，仅有 30% 的埃文基人宣称埃文基语是他们的语言，这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模型生成的值，格鲁吉亚用了 94 周而不是 59 周宣称主权，晚了 35 周，将近 60%。将埃文基的同化水平提升到像格鲁吉亚一样高，会产生了一个类似的但却是相反的效果，这可以从表格 2 中看到。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族群特殊性转到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殊性时，结果却让人震惊。一个区域是否包括非常多的俄罗斯人口似乎并不重要，这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一般认为，大量的俄罗斯人口会减慢或者试图妨碍一个区域从俄罗斯母体中分离出去。然而，结果显示，拥有大量俄罗斯人口的区域将同被少数民族主导的区域一样倾向于分离。尽管统计分析时我们不能确信俄罗斯人口是重要的，但是，“Weibull 系数”的符号表明：越多的“少数民族”意味着越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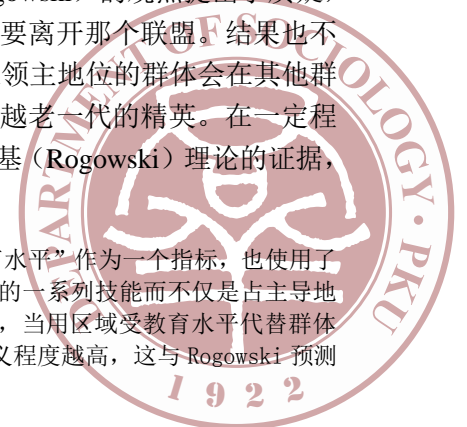
群体技能

统计分析没有支持这个理论：在区域做出是否退出的决定中，族群的精英技能起着重要作用。如之前描述的，Horowitz 认为拥有精英技能的团体更希望留在一个联盟国家里，然而 Rogowski 认为这些群体是最分离的，因为它们可以建立独立国家。既然群体中的大部分是通过教育获得他们的精英技能，所以，我用 1989 年 15 岁以上的联盟国家人口中，族群受到更高教育的人口比例来量化这个变量。结果更支持 Rogowski 的理论而不是 Horowitz 的理论，因为 Weibull 系数的符号是负的，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早宣称主权。¹但是，即使一个人认为更多的案例将会显示这个关系不是随机的，真实环境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可能会特别小。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格鲁吉亚人，把他们的受教育水平降低到与接受最少教育的群体一样，如塔吉克斯坦人，结果只是导致格鲁吉亚宣称主权时间的晚了仅仅一个星期。如果我们将塔吉克斯坦人的教育水平提高，得到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与财富的影响相比，群体受教育水平并不是苏联分离主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精英向上流动性

这份研究表明，区域领导在谋划分离时，没有考虑到族群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向上流动性。为了测量一个特定族群在中央政治、经济统治集团中提升的程度，我主要使用 1989 年每个族群在共产党中的代表性作为标准。共产党的成员身份被认为是获得苏联精英职位所必须的条件，并且，共产党的确包括了诸多经济和政治精英。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变量与主权宣称的时间有显著的统计相关。这对霍洛维茨（Horowitz）和罗戈夫斯基（Rogowski）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群体他们自己的区域之外无法向上流动，他们会想要离开那个联盟。结果也不支持莱廷（Laitin）的“最受欢迎领主”理论，他认为享有最受欢迎领主地位的群体会在其他群体之前走向分离，因为更年轻一代的精英会在独立的议题上试图超越老一代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莱廷（Laitin）理论的证据超过支持霍洛维茨和罗戈夫斯基（Rogowski）理论的证据，

¹为了验证 Rogowski 基于技术的国家生存能力理论，我不仅使用了“群体受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指标，也使用了区域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作为指标，因为国家生存能力也许依靠的是区域整体的一系列技能而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本地区群。结果表明，这个指标与主权宣称也没有统计显著性，实际上，当用区域受教育水平代替群体受教育水平时，系数的符号改变了。这表明，区域受教育水平越低，分离主义程度越高，这与 Rogowski 预测



因为系数符号是负的。这意味着在共产党中（也是向上流动性）拥有最多代表性的群体会越早宣称主权，这也是莱廷（Laitin）预测的。

即使有人认为更多的案例会显示出这种关系不是随机的，然而，研究清楚的表明，向上流动性对苏联分离主义的影响实际上非常小。表格 2 显示，如果我们再次使用反事实的社会实验，把格鲁吉亚人，从最受欢迎领主地位、最有向上流动性的群体降低到最少向上流动性的群体，如塔吉克斯坦人，我们会发现，格鲁吉亚共和国只多用了个星期的时间来宣传主权，由 59.1 周增加到 60 周，这个变化小于 2%。相反的，如果我们把塔吉克斯坦人赋予格鲁吉亚人的向上流动性，我们得到的影响水平大体上是相同的。如果将此与财富影响的程度相比较，向上流动的重要程度明显是很小的，因为，财富使分离主义在原来水平上上升了三分之二。

为了确信这些结果不是因为错误选择了经验指标带来的人为后果，我对每一个群体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性都进行了检验，不论是高代表性还是低代表性。因为新的选举制度可能已经影响了共产党的重要程度，因此，我考虑了 1989 年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以及 1984 年在前戈尔巴乔夫苏联政体下非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议会）中的代表性。在莱廷（Laitin）的建议下，我也在他最近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尝试了该变量一系列其他排列方法¹。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使结果发生重大改变，尽管使用的人民代表大会指标改变了 Weibull 系数的符号，与霍洛维茨（Horowitz）和罗戈夫斯基（Rogowski）更一致，而不是与莱廷（Laitin）一致。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精英向上流动和区域分离主义之间没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曾独立过的历史和曾受过压迫的历史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支持了一个普遍的猜想：有过引人注目历史的区域最可能分离，如民族独立历史或者民族受害历史。首先，我验证了在被苏联控制之前，一个苏联共和国是独立国家的事实是否重要。在苏联的 45 个案例中，这个类型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图瓦，在 1940 年代被吸收进苏联之前，它是一个独立国家。²

另外，我包括了一个较宽泛的分类，分类里涉及历史上只有简短、不重要独立经历的区域或者加入苏联远远晚于其他区域的区域，有波罗的海共和国、图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其次，我验证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族群曾遭受过大范围的族群驱逐的区域（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Karachaevo-Cherkessia]），或者，被强行入侵的独立国家（波罗的海国家）是否会比其他区域更趋向分离。我也尝试了另外两种分类方法，增加了一些区域，这些区域的主要群体中有很多人曾经由于苏联的政策而死亡，例如 1930 年代早期的大饥荒。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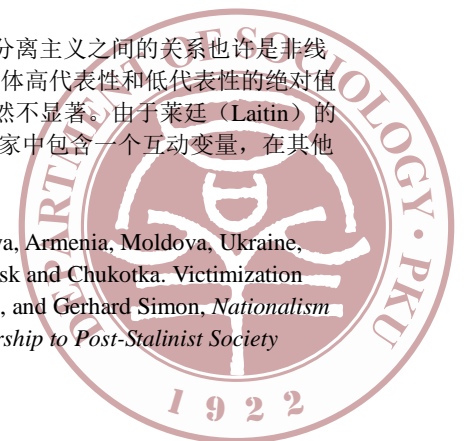
我们吃惊的是，在苏联晚期，在这些变量当中，没有任何变量与主权宣称时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总体来说，受过严重民族罪行（例如，大量驱逐或者征服）的区域与没有受过这些剥夺的区域相比，并不会更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这是现实的事实，不管使用多宽泛或多狭窄的关于“独立”或“受害”的定义。更多的案例也许会证明受害与区域分离主义之间存在重

的结果相反。

¹ 在这篇文章写成后的私下交流中，莱廷（Laitin）提到，最受欢迎领主地位和分离主义之间的关系也许是非线性的，因为，高水平 and 低水平都会比中等水平更联合。所以，我验证了测量群体高代表性和低代表性的绝对值（0 意味着一个群体既不是代表名额不足也不是代表代表名额过多），结果仍然不显著。由于莱廷（Laitin）的中间（“integralist”）分类似乎只针对波罗的海国家，我尝试在波罗的海国家中包含一个互动变量，在其他区域用了最受欢迎领主指标。

² See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for a good discussion of the Tuvan case.

³ This category includes the Baltic states, Kalmykia, Karachaevo-Cherkessia, Chechnya, Armenia, Moldova, Ukraine, Kazakhstan, Turkmenistan, Kyrgyzstan, Buryatia, Yakutia, Evenkia, Khanty-Mansiisk and Chukotka. Victimization data are from Aleks and Nekrich, *The Punished Peoples* (New York: Norton, 1978), and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in particular p. 101.



要的关系，这一点至少可信。系数的符号如预测的方向一样（它们是负的），过去的独立或受害经历会使区域更快宣称主权而不是更晚宣称主权。另外，这些效果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拉脱维亚在 1991 年之前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表格 2 预测，拉脱维亚会比预期的宣称主权的时间晚 26%。然而，受害经历的效果会小些。如果拉脱维亚没有在苏联控制下遭受大规模驱逐，它宣称主权的时间只会比原来晚 8%。重申一下，这份统计研究使我们无法相信这些关系只是随机的。

示范效应

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苏联的“主权队列”中，示范效应起着作用。我会用两种方式展示这一点。首先，由于俄罗斯在规模和集中性上的优点，在理论上，俄罗斯被认为对其他共和国有着最强的示范效应¹，我使用了一个虚拟变量，它随时间变化着，把俄罗斯宣称主权后的时期编码为 1，宣称主权之前的时期编码为 0²。重要的是，把“俄罗斯示例”作为一个变量，我们可以直接验证它的统计显著性，因为要估计它的系数。验证的结果表明，俄罗斯宣称主权的确有影响，似乎会使其他的共和国提前几周宣称主权。³这种影响看起来还很大。⁴例如，如果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同时宣称主权，我们的模型预测，拉脱维亚将会只用 24 周宣称主权，不是原先预测的 38 周，在主权宣称时间上减少了三分之一多。

我证明“传染”确实存在着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时间依赖参数”， p ，这在上面的方法部分讨论过。重要的是，这个参数的估计值远大于 1。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特定区域宣称主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要承认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但仍然有理论依据断定，时间依赖参数可以合理模拟出我们感兴趣的示范效应。实际上，在早期宣称主权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莫斯科镇压的危险会减小，这一点越来越清晰，苏联领导们不会动用武力，也不会用暴力平息这些运动。主权概念不断上升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时间函数。

俄罗斯（由于它的规模）和爱沙尼亚（由于它是第一个宣称主权和破冰的）分别对宣称主权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这两个共和国扭曲了时间和示范效应之间的关系。如前一段所描述的，我通过把俄罗斯直接纳入到研究中来控制俄罗斯这一个案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精确地发现，如果时间依赖参数反映了传染效应并且俄罗斯对于主权的宣称有足够大的示范效应，那么在嵌入俄罗斯范例这个变量后，时间依赖参数的估计下降了一半。我使用爱沙尼亚宣称主权的时间作为我测量持续时间的起点，以此来控制爱沙尼亚的开创性举动⁵。因此，这样来谨慎地解释 $p > 1$ 的时间依赖参数结果，我确信示范效应对于鼓动苏联分离主义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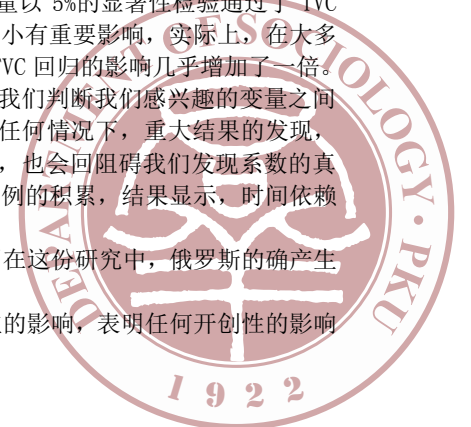
¹ The argument that Russia declaration had a huge impact has been made by Gail W. Lapidu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Dis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Perestroika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apidus and Victor Zaslavsky, with Philip Goldman, eds.,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5-70, at p. 59); and also by Gwendolyn Stewart, who has illustrated this well in an unpublished graphic provided to the author.

² 自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资料组是一个 TVC（时间变化的协变量）资料组。看 Bennett and Stam, “The Duration of Interstate Wars”, 作为 Weibull 回归中使用 TVC 的一个例子。

³ 然而，“传染”对于我们是否确信变量是否在起作用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变量以 5% 的显著性检验通过了 TVC 回归和非 TVC 回归。增加俄罗斯范例这个变量确实对于估计自变量系数的大小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在大多数案例中，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当我们由非 TVC 资料组转到 TVC 资料组中，TVC 回归的影响几乎增加了一倍。重要的是，这表示，这个模型所没有控制的任何类似的传染效应都不会影响我们判断我们感兴趣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俄罗斯主权宣称的效应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共和国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重大结果的发现，都会引人注目，在发现之外包含着各种噪音。这些非俄罗斯示范效应的存在，也会阻碍我们发现系数的真正大小。由于 P 参数在 TVC 模型中很小，也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共和国范例的积累，结果显示，时间依赖参数反映了传染效应的大部分。

⁴ 接下来的段落会解释，俄罗斯范例这个变量会使时间依赖参数减少一半，表明在这份研究中，俄罗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⁵ 原来爱沙尼亚（它是计算因变量的一个起点）对于时间依赖的评估有无足轻重的影响，表明任何开创性的影响都是不重要的。



结 论

这份统计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高财富水平、低同化程度以及高度自治水平会促使一个以族群界定的区域更快地宣称主权。这篇研究证实了我早期的观点，我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联盟国家内，富裕区域是最倾向于分离的，因为如果其他群体获得了控制国家的权力并且无限制地使用这种权力，富裕区域会失去的将会最多。而且，如贝茨(Bates)所说的“现代性产品”，贫穷区域如果继续留在一个联盟里，它所得到的也最多。研究结果增强了特雷斯曼(Treisman)观点的可信性，即很多分离主义行为可以用中心和区域在资源上的讨价还价过程来解释。通过在统计分析中包括三个而不是两个水平的自治性，目前这一研究比特雷斯曼(Treisman)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他假设，已有的自治性水平越高，民族主义的激进程度越高。这个结果与戈伦伯格(Gorenburg)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他认为，在区域分离主义的背后，真正激起了社会需求的是制度，而不仅是中心-边缘的讨价还价。研究结果确证，在苏联晚期，族群独特性和示范效应有力地影响了民族分离主义。

有一个发现最令人吃惊：当把区域富有、自治性、族群独特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后，族群是否有过独立历史以及受迫害历史，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民族分离主义水平上的不同。这表明，族群团体并不必然会由于不幸的过去而与四邻陷入永久的敌对状态中，因为物质方面的考虑会使区域领导人不去启用“分离主义”的符号作用，甚至是在危机时期。

这份研究指出，研究者需要在更广阔的情境变量下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工作，这也许展示了一个特定的观点也许会在很多国家起作用，但却在另一些国家不起作用。尽管一些理论得到了很强的支持(Gorenburg的理论、我自己的理论、Treisman的理论)，产生出一般性的结论，利用了比较广泛的政治传统，但是，它们只能被严格运用在(前)苏联案例中。参照苏联晚期的情况，莱廷(Laitin)的观点也得到发展，其他人也明确说明他们的观点只能用来解释苏联案例。在这儿，不被支持的大部分主要理论(Brass、Hechter、Horowitz以及Rogowski)却在非洲、亚洲以及/或者西欧案例中得到了发展。因此，摒弃这些理论之前，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理论所做出的假设，因为这会影响我们将如何使用它们。例如，或许，苏联解体后，过渡时期的情境，改变了基于群体技能和向上流动性的预期收益计算，不再像霍洛维茨(Horowitz)、罗戈夫斯基(Rogowski)和莱廷(Laitin)描述的那样。或者也许，在这儿没有得到支持的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族群的行为，但不能解释研究者所关注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研究中得到有力支持的理论应该在其他情境下继续被检验，而这个过程会提高我们理解分离主义行为的能力。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